

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

任 虎

【提要】 在范文澜从传统国学研究转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过程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时,在历史科学理论和编写方法方面,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重要理论资源和参考对象,并以其为参照构建中国通史编纂体系,影响了此后国内史学界的中国通史书写模式。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范文澜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过程中不仅纠正了以往存在的史料和考订方面的缺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认识。

【关键词】 范文澜 斯大林 《中国通史简编》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刘大年认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① 以往学界关于《简编》理论背景的描述,多概言范文澜的经学底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受到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框架的启发,以及对当时一些国际左派中国史著作的取鉴,却极少深入探究他编写《简编》的知识背景和唯物史观理论来源。^② 实际上,范文澜已明确提示,《简编》的编写受到苏联史学尤其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的影响。^③ 学界虽已关注到这一点,但缺乏细致梳理。^④ 因此,本文从范文澜通过《联共党史》系统学习并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入手,深入发掘相关回忆史料和其他文献,具体呈现他“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的过程,^⑤并尝试重新梳理《简编》的历史科学理论和编写方法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项目编号: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林国华《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212页等。赵庆云强调“范文澜的读书情况、知识背景等至今无人进行考察,而这对于把握他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关键的。”参见赵庆云《范文澜研究综述与展望》,《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6月。

④ 许冠三注意到“范文澜开始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从“‘认真圈点’《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选集》入手”(《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45页);洪认清关注到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是按照“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分析商、周的社会性质”(《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淮北煤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但都未深入探究。

⑤ 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页。

一、范文澜学习唯物史观始末

范文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之一,最初并非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名于学界。他自五四时期始就以抵制“白话文”、研究“好古之学”、“追踪乾嘉老辈”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① 1927年以后,他在政治上向共产主义转变,担任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团领导人之一。1939年9月,他在鄂豫边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②同年底经组织安排前往延安。^③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学习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和进行“历史学工作”,^④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在延安完成《简编》。该书被誉为是“仅此一部”的“用新史观来编写整个中国的通史”,^⑤更被毛泽东盛赞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⑥范文澜的“新史观”究竟发端何处?以往学界虽已注意到范文澜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系统接受唯物史观并以此指导历史研究,却极少探究他的理论来源和编写过程。^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简编》的写作情境进行探讨。

在此之前,虽然国内学界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以来已出版了诸多中国通史著作,但中共史家对这些著作并不满意,认为它们“并没能说明中国史”,^⑧因此一直有运用唯物史观编撰中国通史的计划。在唯物史观阵营外,中共史家不仅对“王家年谱”“起居注”的旧式史学一概推翻,而且认为章太炎、黄季刚、顾颉刚等“对所谓国学有较深的素养”的学者,以及胡适、冯友兰等在“实验主义”指导下编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不能应用正确的方法论”,“无法对史料达到正确的选择、搜集与认识”。^⑨在唯物史观阵营内,中共史家不仅对风靡甚久的“外国人替我们写的几本社会史”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在历史理论、结构编排、政治观点等方面存在错误;^⑩而且对“社会史论战”后中国唯物史观学者创作的“几部较正确的断代中国史前史、奴隶制度史、初期封建史、近世史”,也认为他们“还没有完成一部较正确的社会通史,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面目系统地复现出来”。^⑪同时,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这部中国通史还承载着更为现实的任务,它不仅要用“马克思列宁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

①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

② 范文澜曾在五卅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因北平笼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之下而“失去组织联系”。叶毅均《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范文澜前传》,三民书局2020年版,“自序”第2—3页。

③ 《范文澜同志年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360页。

④ 毛泽东《致范文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⑤ 叶螭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1941年7月31日。

⑥ 佟冬《我的历史》,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⑦ 潘汝暄《范文澜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尹俊忠:《范文澜在河南大学期间的革命活动》,《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叶毅均《走向革命:1920年代范文澜急速政治化的历程》,《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⑧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0年版,第112页。该文提及萧一山《清代通史》、王桐龄《中国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等。

⑨ 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9月《本国史研究提纲(上)》,《读书月报》第2卷第4期,1940年6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12页。

⑩ 刘亚生《略评几本外人著的中国历史》,《解放日报》1942年1月17日。该文提及森谷克己、佐野袈裟美、沙发诺夫等国际左派人士的著作。

⑪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12页。

且要“用以教育中华民族的后辈 激动我国青年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的热情”。^①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②同年底,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历史研究室,由陈伯达担任主任,成员包括杨绍萱、佟冬和尹达三人,主要负责落实“毛泽东同志关于要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指示”。但由于陈伯达“极少过问研究工作”,研究计划被暂时搁置,这一状况在范文澜到来后发生改变。^③

范文澜在1940年1月到达延安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历史研究室主任,受毛泽东委托“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④该通史由范文澜担任主编,叶蠖生、尹达、佟冬、唐国庆、金灿然等人参加,以“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分工编写,但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编法不一,各部书稿详略不当,遂最后由范文澜“从头写”。据叶蠖生回忆,这部通史既需包含历史规律,又需具备通俗性,“以供丙级学习干部之用”。因为“这一类干部多未学过社会进化史”,所以要求作者具备相当程度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和历史写作能力。^⑤但据范文澜回忆,他在着手编写《简编》时虽有经学根基,但“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材料的掌握和历史知识也很差”。^⑥直至正式开始编写《简编》工作后一个月,他依然认为自己对马列主义“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⑦在回忆编写过程时,他更自嘲《简编》是他如“一个小孩子初学走路”般初次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编写过程“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模样”。^⑧即使考虑范文澜过于自谦的因素,这些回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对自身唯物史观知识储备的不自信。

范文澜关于《简编》编写过程的感慨,比较符合他从传统国学研究转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历程。1922—1927年,范文澜在任教南开大学期间受到五卅运动的刺激,开始从“追踪乾嘉”向共产主义转变,通过学习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来纠正“乌托邦的幻想”。^⑨该书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转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问题,而在唯物史观阐述方面较薄弱。^⑩这是范文澜自述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1927年以后,他前往北平,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据考察,范文澜在该时期与中共来往密切,积极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因此叶毅均推断他“对于攸关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想必同样关注……这场论战应当是他从国学领域过渡到古史研究的契机之一”。^⑪

从范文澜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的历史著作来看,当时他尚未将唯物史观应用其中。他在1931年出版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正史考略》,就性质来说只是“基于《文心雕龙》‘总论文体’的视野

①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③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0页。

④ 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70页。

⑤ 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1941年7月31日。

⑥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6月。

⑦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第2卷第2期,1940年11月。

⑧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6月。

⑨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学家学记》(上),第132页。

⑩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新青年社1926年版。

⑪ 叶毅均《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范文澜前传》,第338页。

来观照二十四史”^①，仅为“窃观前儒著述……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为他日“翻阅正史”之助力。^②而1936年出版的《大丈夫》，虽为《简编》“开拓了先路”，^③但也只是出自将史书小说翻译为白话文“消遣”的初衷。^④这说明直至1936年，范文澜虽已开始接触唯物史观，但并未系统学习并将之运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他先后前往中共鄂豫边区和延安，才开始系统学习唯物史观。

范文澜曾回顾系统学习唯物史观的经过，强调自己1939年春在鄂豫边区党委期间“反复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选集》”，但基础还不够深，“只能算是马克思小而又小的学生，比芝麻还小的小学生”。9月，他离开边区到达延安以后，“接触马列主义的书多了些，学习了干部必读的若干本书，增加了书本知识”，由此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⑤据同在边区党委的王阑西回忆，范文澜经常在夜间“读《联共党史》、《斯大林选集》，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学习札记”。^⑥另据其哲嗣范元维回忆，范文澜从边区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扣留，也是由于被查出随身携带《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⑦显然，范文澜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始于二书。1940年8月至1941年底，范文澜用“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⑧完成数十万字的《简编》，应该说是以快速学习马列主义为基础的。相较《斯大林选集》(解放社1939年版)尚未收入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主义》)，^⑨《联共党史》则在第4章第2节专列《主义》，显然该书对他学习唯物史观的影响更大。《联共党史》究竟为何对范文澜产生如此巨大影响？它与中共历史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又有何关联？

二、《联共党史》对马列主义学习的推动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国内学者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认识，不仅因国际环境的刺激而主要受日本与苏俄(联)的影响，同时因译介途径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存在各种流派如“修正主义”“改良主义”“革命主义”。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前夕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参战各方虽都以唯物史观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却并不“了解(解——引者注)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的唯物论”。^⑩国内唯物史观学者各执一说，乃至出现了“烦琐学派的倾向”，^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来源多样，迟迟没有树立一个权威典范。因此，构建具有准确性与合法性的唯物史观就至为关键。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确立了以斯大林为领袖的联共(布)中央的统一领导。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联共(布)不仅在政治上通过一系列举措巩固领导权，而且通过1938年9月《联共党史》的出版，

① 叶毅均《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范文澜前传》，第301页。

② 范文澜《正史考略》，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绪言”，第8页。

③ 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页。

④ 范文澜《大丈夫》，开明书店1936年版，“抄在书头”，第1页。

⑤ 转引自潘汝暄《范文澜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16页。

⑥ 王阑西《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人民出版社编《革命回忆录》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⑦ 范元维《我的父亲范文澜在河南的一段经历》，《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516页。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再版说明”，第5页。

⑨ 《斯大林选集》由延安组织人员编译，自1939年1月起发行五卷本，时间范围自1924年4月初至1938年5月17日，而斯大林《主义》发表于该年9月。

⑩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2年11月。

⑪ 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

在思想上统一了联共(布)党史以及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作为由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编著、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唯一的党史教科书”,该书从学理上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核心的新马列主义哲学体系。它还在历史科学领域树立了“历史阵线的模范”,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方法论”“主题”和“技巧”的参照,更成为历史学者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和“推动科学前进”的典范。^①自其1938年出版以来,除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组织翻译中文版以外,国内的翻译也非常迅速,不仅在当年11月就出现节译版,更在次年分别由重庆中国出版社、延安解放社、上海启明社出版了三种中译本。^②

中共重视《联共党史》对现实政治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自它被译介入中国,就在中共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推动下,成为“在中国流行最广的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③在政治方面,中共将《联共党史》列为各级党校的课程标准,在各机关组织成立《联共党史》研究会和读书小组,^④还专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⑤1940年初,中共发布《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明确将“联共党史”与“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列为中、高级干部必修课程。^⑥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联共党史》“结束语”被列入《整风文献》。其后,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强调研究马列主义要以《联共党史》为中心,号召改造党内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⑦1942年以后,该书多次被列为中共“干部必读”,以促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联共党史》被确立为中共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文本,标志着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共史学界取得某种权威地位,这基本改变了“社会史论战”时期各执己见、流派纷呈的现象,给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最正确而又简单的叙述”。^⑧

《联共党史》对中国历史书写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指导作用,这表现在中共对《联共党史》及其他苏联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过程、原则和方法的关注与学习。苏联在1934年开始组织重新编写“苏联史和新历史”等历史教科书,并在1936年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委员会”来“审查和根本改造”既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此过程中,斯大林、日丹诺夫以及苏联政府征奖评定委员会等还提出了关于制定新苏联史、近代史的具体编写原则和修改意见。^⑨《联共党史》正是在此影响下的主要成果之一。中共先后两次呼吁学习苏联的历史编写方法:1937年,延安《解放》周刊开辟“理论研究增刊”,在第1期就刊登了斯大林《论联共党史课本》等联共党史研究材料,并号召中共历史学者要

① 雅鲁斯拉夫斯基《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心清译,《解放》第128期,1941年5月。

② 参见朱宝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许冲《出版发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资料为例》,《理论探索》2013年第2期;蒲国良、曹钰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等。

③ 杨松《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解放》第128期,1941年5月。

④ 杨松《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解放》第128期,1941年5月。

⑤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249页。

⑥ 《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⑦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⑧ 博古《前言》,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译,中国出版社1939年版,第1页。

⑨ 《怎样写历史》,师哲编译,《解放》第134期,1941年8月。

将斯大林关于编写联共(布)党史的原则、方法和提纲“作为研究的参考”。^① 1941年,《解放》周刊又“专载”了苏联方面在1934—1936年间通过和发表的关于《怎样写历史》的相关材料,编者再次强调“编写及学习历史的同志”应深刻注意和研究“斯大林同志、联共(布)党中央及苏联政府关于如何编写苏联史及新历史的指示”。^②

范文澜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即计划通过学习西方史、中国史、《联共党史》的方法,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编成一套关于中国革命好的教科书”。^③ 由他领导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更成立了“《联共党史》读书组”,并“拟以《党史》为中心,进行阅读列宁、斯大林之重要作品”。^④ 因此可以说,中共在毛泽东发起和领导下的以《联共党史》为重要内容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贯穿了《简编》的编写过程。

三、《简编》与《联共党史》的理论关联

范文澜虽在“社会史论战”时期较沉寂,但他以《联共党史》作为系统学习唯物史观的起点,为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了基础。正如1941年8月《简编》编写成员叶蠖生在《简编》上册行将出版之际所说:“《联共党史》的介绍入中国,给予历史学者一种最新鲜的最标本典型的模范,无论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或在处理史料技术方面,都给以典范的作用,使历史学者得一正确遵循的途径。”^⑤ 这不仅提示了范文澜编写《简编》的“历史科学理论”和“处理史料技术”来源,更反映出当时延安中共史学界的基本价值取向。

范文澜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划分中国历史分期。此前的唯物史观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有不同看法,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等问题上展开激烈辩论。争论聚焦于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否一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东方社会所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

据叶毅均考察,范文澜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具有“反托派”立场。^⑥ 他“从那时就着手钻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⑦ 只是并未著书立说。直到1940年编写《简编》时,他才以斯大林《主义》为依据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与同时期的中共史学界情况基本一致。究其原因,虽然中共早期就通过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政治文件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⑧ 但在中共史家看来,自1927年以来“还没有积极的伟大的理论著作”,来对“托派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作系统批判。^⑨ 直到《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主义》传入,才提供了权威依据。因为《主义》是在

① 斯大林《论联共党史课本》,《解放》第1卷第13期,1937年8月。

② 《怎样写历史》,师哲编译,《解放》第134期,1941年8月。

③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

④ 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计划(三年计划)》,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282页。

⑤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84页。

⑥ 叶毅均《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范文澜前传》,第340—341页。

⑦ 刘之惠《范文澜同志在三十年代的几件事》,《奋斗》1981年第11期。

⑧ 如,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就明确提出“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参见《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410页。

⑨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

批判“托派”基础上发展而来,已经被苏联学者广泛认为其“理论原则获得了异常的力量和不可反驳性”。^①《主义》规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依据“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②这一提法获得了中共史学界的普遍接受。

范文澜确实参照了《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他在《简编》编写前的1940年5月就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绝无例外的要经过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③他从《联共党史》中引用有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特征的规定,结合《尚书》《左传》等史料,论述殷与西周分别为奴隶制与封建制。他通过分析殷代的金属生产工具是否被初步运用、畜牧业农业等生产部门分工是否出现、部落之间是否出现交换、奴隶与阶级斗争是否大量出现等《联共党史》规定的条件,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备具,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而通过分析西周是否存在《联共党史》所列封建社会的农奴、铁器加工、农业、手工业、阶级斗争等情况,断定西周虽然“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保留还是很多”,但“已开始封建社会”。^④此后,他还就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延安组织了讨论会,作进一步意见吸收和总结。^⑤

正式写作《简编》时,范文澜或许是受延安整风批判教条主义的影响,^⑥未在初版中明确交代他对奴隶制、封建制分期的依据,但在修订版中他再次坦言分期的依据是《联共党史》,因为《联共党史》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规定了定义”,若“不切实根据这个定义,所说便缺乏可靠性”。在此基础上,他从决定社会性质的“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基本的所有制”出发,分析“商周两朝统治者对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的不同”,进而对商周社会制度下“断言”。^⑦

在修订版中,范文澜不仅指明奴隶制、封建制分期的依据是《联共党史》,而且明确表示他对二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同样是根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情形”。^⑧他以《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参照,认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情况与《联共党史》中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关系情形相符合,所以定为“初期封建社会”;秦汉至南北朝,“因为生产力比前一时期显著提高了,而奴隶劳动的存在,对前一时期还处在‘承前’状态中,所以定为中期封建社会的前段”;隋唐至元末,因为“这对后一时期还处在‘启后’的状态中,所以定为中期封建社会的后段”;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因为“这个封建社会里怀妊着新社会的成了初形的胎儿,所以定为后期封建社会”。^⑨

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不仅在划分历史分期时将斯大林理论与中国史料相对照,而且在《简编》主体内容中也采用了将经典理论与史料配合的叙述方式,这是对《联共党史》的“对照式”回答。以

① 雅鲁斯拉夫斯基《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心清译,《解放》第128期,1941年5月15日。

②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社1949年版,第165—169页。

③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

④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

⑤ 据茅盾回忆,1940年6—10月期间范文澜在延安组织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参见万树玉编著《茅盾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⑥ 参见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33—34页。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28页。

⑨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29—30页。

《简编》第2章“简短的结论”为例,他指出“因为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不能促使生产关系起重大的变化,对旧传公社制度,也不能作更多的破坏。所以按本质说,商代自然是奴隶社会,但公社制度,依然还保存很大的残余。”^①这实际上回应的是斯大林强调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变更和发展,于是人们底生产关系,人们底经济关系,也与此适应而变更和发展”。^②这种“对照式”论证已经内化于《简编》全书,读者不注意即会略过。

例如,早期的中共史家在研究工农运动史、革命史时,虽已自发运用“阶级斗争”模式来反映中国社会的阶级压迫、剥削问题,^③但并未系统应用于中国通史。《联共党史》应用“阶级斗争”史观梳理联共(布)五十余年发展史中不同阶段的路线、阶级斗争,以及斯大林将一般社会发展史中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进行理论概括的做法,对中共史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斯大林认为“生产力底变更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与此相适应的变更和发展”,除了原始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他三种社会形态中都有剥削和阶级存在,因此历史发展就是“由被压迫阶级所进行的革命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梳理了奴隶制度是奴隶主与奴隶,即“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的残酷阶级斗争;封建制度是封建主和农奴、农民、手工业者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④

范文澜接受了这一观点,不仅将其应用于批判经学,称其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是“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⑤而且在《简编》中予以实践。在探究商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时,他引用《联共党史》对“阶级斗争”的叙述,结合《尚书》《左传》以及“卜辞”等记载,分析中国奴隶社会存在奴隶主阶级、贫人阶级、被剥削阶级、奴隶阶级,封建社会存在剥削(掠夺)阶级与被剥削(被掠夺)阶级。^⑥

在此基础上,范文澜强调“人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⑦要“注意到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⑧他以“揭露统治阶级罪恶”为旨趣,^⑨认为新旧阶级斗争才是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⑩他纠正了“旧型类历史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骂农民起义”,肯定了“被压迫者起义的作用”,着重书写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英勇抵抗外族统治者的经过,说明“中国人民确实富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伟大革命传统”。^⑪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27页。因《简编》1947年新知版是据延安版重排,故本文所引《简编》以新知版代替。

②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5页。

③ 如刘少奇、朱少连的《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1922),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1923)、《二七大屠杀之经过》(1923),瞿秋白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1926),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等论著。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65页。

④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47、165—168、169页。

⑤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

⑥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49页。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11页。

⑨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历史研究会序”,第2页。

⑩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764页。

⑪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11—12页。

四、《中国通史简编》借鉴《联共党史》的编写方法

范文澜在编写《简编》过程中积极借鉴《联共党史》的“史论结合”写法、历史叙述主体观、框架结构和语言风格。当时,延安的写作环境较严峻,缺乏写作需要的史料和最新的研究参考,也缺少充分的研究基础。范文澜回忆说,“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那时要找《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加上时间紧迫,没有充足时间进行史料考订和专题研究。虽然这种情况下《简编》“不可能写好”,但“只要是尝试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写的历史,总比旧型类的任何历史书要好些”。^①因此,范文澜采取了“史论结合”的写法。他认为虽然“材料不够”,但《联共党史》“给予我们以明确的指示”,只要以《联共党史》为标准,就“可以在生产关系方面找出实际证明”,不会出现生产力“平空臆测”的情况。^②

其次,范文澜关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叙述主体观也是来自《联共党史》。^③斯大林将社会发展史定义为既是“生产发展史”,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因此,他反对将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④相应的,在1941年初版中,范文澜反对将历史归结为“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强调书写“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⑤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明确主张“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⑥在1953年修订版中着重强调书写任务就是要“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⑦

再次,《简编》的框架结构以《联共党史》为参照,这是对1937年延安《解放》周刊登载的斯大林关于“怎样研究联共党史”的意见,以及1938年根据该意见编写出版的《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的效仿和实践。在章节标题上,《联共党史》与《简编》都采用“内容——时间”这一标题形式,使读者对其内容一目了然,如“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底成立——秦”“封建经济发展时代——唐”“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

在每一时期的章节排序上,范文澜采纳斯大林关于“应当在课本的每章(或每节)之前,加以一段关于本国经济政治情形简明的历史的解释,否则,联共党史将不能成为历史”的编写意见,^⑧将有关经济、生产方式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容置于首要位置,然后再论述文化、政治、法律、军事等上层建筑内容。

在具体章节顺序上,范文澜根据斯大林关于《联共党史》编写时,每章结尾应当对事实“以马克

①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6月。

②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

③ 学界在1953年已经认识到了范文澜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观点是遵照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示”。参见宗家瑞等《我们对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的意见》,《人民日报》1953年4月14日。

④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2页。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历史研究会序”,第1页。

⑥ 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先生在北大讲》,《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10页。

⑧ 斯大林《论联共党史课本》,《解放》第1卷第13期,1937年8月。

思主义的解释”的要求^①，效仿《联共党史》每章必有“简短的结论”的编撰体例，在《简编》每章最后一节都以“简短的结论”对该章内容进行概括和理论总结。据卞孝萱回忆，范文澜晚年在编写《中国通史》时，仍然强调每册结尾要有“简短的结论”，即使在生病以后，依然要亲自改过一遍以示重视。^②

最后，《简编》语言风格以《联共党史》为典范。范文澜模仿《联共党史》力求统一话语体系，采用许多带有绝对语气的词汇，如“就是”“最是”“必然”“必须”等；同时，他一改早年反对使用白话文的观念，转而反对使用晦涩难懂的古文，提倡采用通俗生动、浅显直白的白话文，即使迫不得已，也会采用注释的方式，如“征我东鄙(边)”“妻生的儿子(嫡子)有王位继承权”等。“全用语体”正是贯彻了《联共党史》“应当以简单的叙事的口吻，来叙述各种倾向与派别间激烈斗争的事实”的要求。^③

综上可知，范文澜在编撰《简编》的过程中，在历史科学理论和编写方法方面，参考和借鉴了《联共党史》。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文本在他编写过程中的影响。

结 语

在革命与民族抗战的年代，《联共党史》这样一部反映“苏联成功经验”的历史著作，对于在抗战和国共斗争中的中共来说，为确立唯物史观话语权和建构中国通史编纂体系提供了参照。《联共党史》本身存在的教条化和主观化的理论缺陷，虽然影响《简编》的编写，但在《简编》的不断修订中，范文澜已经能够克服教条化认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底生动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生硬公式”。^④

从《简编》的编写和修订过程来看，1940年5月，范文澜以《联共党史》为依据划分中国历史分期，而在三个月后正式写作《简编》时，则将斯大林唯物史观具体应用于历史书写，不再拘泥于从形式上寻求对《联共党史》的呼应和一致。1948年由华北新华书店再版时，他又针对1941年延安新华书店初版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应用，作出理论的完善和更正。他摒弃了过去单纯的“线性认识”，而能够认识到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发展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集中精力修订《简编》，开始突破斯大林唯物史观的绝对权威。1954年，他通过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来补充《简编》，针对斯大林“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的观点^⑤，强调秦汉时“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⑥他将这种观点融入《简编》修订版中，为《简编》的完善和接下来《中国通史》的编写迈出了坚实的一步。^⑦他显然开始反思以往奉为圭臬的斯大林唯物史观，并重新回归中国历史本身。

(作者任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24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① 斯大林《论联共党史课本》，《解放》第1卷第13期，1937年8月。

② 卞孝萱口述《冬青老人口述》赵益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③ 斯大林《论联共党史课本》，《解放》第1卷第13期，1937年8月。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绪言”，第10页。

⑤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8页。

⑥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⑦ 范文澜晚年再次受毛泽东委托编写《中国通史》，1969年去世后由蔡美彪继续主持完成，于1995年在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0册《中国通史》，后又增订至12册。

tradition ,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cross-lingu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odern village historiography and its practice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ne can analyze villages as a social unit in historical reflection. It is thu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o take the study of modern rural history as a starting point , which often takes on a biographical form. In research , one need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and examine its logical framework , its materialistic basis , and the degree of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 doing so , one can conne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nt with universal analysis , so as to start to discuss the emotional and rational scal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 Short Course* on Fan Wenlan's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Ren Hu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 Short Cours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Fan Wenlan's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en Fan compiled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C. P. S. U. (B.) : Short Course* was his main theoretical source. Following its structure , *The Concise Edition*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influencing the writing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oretical inquiry , Fan Wenlan not only corrected some flaws from the past works in their use and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 but also , to some extent , overcame the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Max Weber , Genealogy ,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ism // Li Fangchun

Max Weber's cultural-history masterpiece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contain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ethod , "genealogy" , which he inherited from Nietzsche. He transforms into a method for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The primary task of this method is to identify and determine the cultural "parentage" of an "historical individual". Weber carries out a brilliant "genea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spirit" and henceforth , establishes *The Protestant Ethic* as a classic in th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scienc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ocial History to History of Emotions: French Historian Alain Corbin // Zhou Xiaolan

Alain Corbin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that grew up under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rnest Labrousse , he examined Limousin's unique economic and societal landscap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dissertation project. This experience made him realize the limits of Labrousse's research paradigm. After that , he followed the mental history approach first proposed by Lucien Febvre in the 1940s and traced the evolution of olfactory and auditory senses , as well as the social imaginaries that derived from them. In doing so , he constructed a sensory system ,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his history of "sensibilités". After Michel Foucault's publication of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May 1968 event that shocked the French academia , Corbin shifted his focus to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or individuals in his subsequent research. This approach , is known as "une histoire sans nom" . Thanks to the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progress in the field , Corbin has been attempting to contextualize literary materials so as to develop a unique paradigm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roughout his life , Corbin has been looking for a historical synthesis outside Braudel's total history paradigm. His career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1970s.